



红色记忆

“我为这斗争贡献了我的生命”

——中国工人运动早期著名领袖之一罗登贤的红色足迹

罗登贤(1905-1933)，广东南海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早期著名领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抗日武装的主要创建者之一。他曾三次被捕入狱，但仍不改铮铮铁骨，终其一生为革命事业奔走奋斗。1933年中共中央评价罗登贤是“反帝抗日的急先锋”“中国工人阶级最忠勇的领袖”。

从工人中走出来的工运领袖

1905年，罗登贤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今属佛山市禅城区)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父母双亡，由在香港打工的姐姐照料，11岁时随姐夫进入香港太古船厂当学徒，学成后在厂里做钳工。当时的粤港地区作为繁荣口岸，近代工业发展迅速，香港工人阶级应运而生。在港英当局的统治下，香港华工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和资本家的剥削压迫。随着西方各种流派学说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工运思潮在工人阶级中逐步宣传和扩散开来。

1920年4月，机器行业劳资关系恶化，香港船坞、电力、煤炭等20多家工厂工人为争取民主权利举行大罢工。罗登贤和太古船厂工人也积极参加罢工斗争，反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4月18日，经香港机器行业劳资双方协议，工人工资增加20%至32.5%，罢工取得了胜利。在这次斗争中，罗登贤认识到组织工会来团结工人力量的必要性。之后，他与厂里的工人积极分子筹划成立了本厂的华人机器工会，并积极参加工会活动。

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各行业工人积极响应，罢工浪潮席卷香港。面对工人的一致罢工，陷入被动的香港当局在采取高压政策和恐吓手段不成后，又唆使华人机器工人头目到处游说，诱骗工人等待“工界调停”，企图阻止工人参加总同盟罢工。随即，罗登贤等人在太古船厂召开工人大会，及时揭穿港英当局和“黄色工会”(即被资产阶级或其政府收买的工会)的阴谋，让工人认识到“调停”的实质是妥协，号召大家将罢工进行到底。在他的带领下，太古船厂的工人进行了坚决斗争，最终以资本家为工人增加15%的工资取得罢工的胜利。由于罗登贤在罢工斗争中表现突出，得到工友们的支持和拥护，但也因此遭到资本家的忌恨。他们勾结港英当局以“煽动工人闹工潮”为由将罗登贤逮捕，并判处半年徒刑。艰苦的牢狱生活并没有动摇罗登贤的革命信念，反而使他越挫越勇。出狱后，他又积极投入到工人运动中，联合其他工运积极分子成立香港金属业工会，并成为该工会的领导人之一。

1925年春，罗登贤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为声援五卅运动，邓中夏和苏兆征等人以全国总工会的名义召集香港各工会联席会议，成立全港工团联合会，决议罢工。罗登贤被任命为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秘书，协助苏兆征组织工人参加罢工。当时，香港地区的工会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已有的140多个工会团体中大部分是行业工会和手工业工会，产业工会很少，且多数工会受资本家和黄色工会头目操纵。面对这种情况，罗登贤与党团员、工友们采取包干的方式串联发动各个行业的工人。除此之外，他还采取个别联络、散发传单等方式广泛宣传和发动工人群众。最终，在罗登贤等人的周密组织下，香港海员、机器和船坞工人的宣传工作顺利完成。

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工人、印刷工人率先宣布罢工，其他行业的工人纷纷响应，省港大罢工爆发。随后，罗登贤率领军港罢工工人回到广州，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在我党的坚强领导和广州革命政府的有力支持下，省港罢工委员会团结广大农民群众，进行了封锁香港、审判工贼等重要政治活动。此时，省港罢工委员会实际上已承担起部分政权组织的任务。罗登贤在此次罢工中显示出坚定的革命立场和杰出的领导才干，得到我党组织的充分认可。1926年10月省港大罢工结束后，他被选为中共香港市委常委，继续领导工运工作。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的国民党反动派又以“清党”为名制造了“四一五”反革命屠杀，中共广东区委被迫转入地下工作。4月下旬，为进一步加强我党在广州地区的领导，中共广州市委重新建立，罗登贤当选中共广州市委委员，协助市委书记吴毅和组织部部长周文雍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斗争。根据八七会议确立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8月20日，广东省委召开讨论广东全省暴动计划。10月，罗登贤被选为广东省委委员，协助张太雷等人进行暴动的准备工作。面对腥风血雨，罗登贤毫不畏惧，往返于粤港之间进行秘密联络和准备。他与周文雍等把工人自救队、省港罢工工人利益维持队、海员工勇队等广州工人武装改编为统一的工人赤卫队，并按行业编为7个联队。罗登贤参与了赤卫队总指挥部的领导工作，并兼任第一联队长。赤卫队还成立了秘密兵工厂，赶制手榴弹、炸弹和梭镖等武器装备。

12月11日，广州起义的枪声打响后，第一联队敢死队在罗登贤的指挥下首先发起冲锋，其他队员也奋不顾身地冲向敌人。之后，在援军的支持下，他们向敌人的军事重地广州市公安局发起进攻，把敌人的机枪和装甲车炸坏。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起义军占领广州的绝大部分市区。12日，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此时，国民党反动武装各路军队疯狂反扑，罗登贤率队在长堤一带抗击进攻珠江北岸的敌军。工人赤卫队激烈作战，击退敌人数十次进攻。最终，起义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之后，罗登贤被迫转移到香港继续开展地下工作。

1928年4月底，周恩来等人前往莫斯科筹备并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罗登贤被派往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7月，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罗登贤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协助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指导全国工人运动。1929年2月，苏兆征病逝后，罗登贤被任命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此期间，他指导了上海邮务工人罢工、法商水电工人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931年春，罗登贤被党中央派往东北工作。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奉行不抵抗政策，引起国民强烈不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9月19日(即事变爆发的第二天)，罗登贤就与中共满洲省委的同志召开紧急会议，发表《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21日，中共满洲省委发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指出“只有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的军队是真正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逐出中国”，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号召群众罢工、罢课、罢市”，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随后，在一系列宣言的带动下，东北民众的抗日热情被点燃了。

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后，为清除侵略障碍，便企图扑灭中共满洲省委机关。10月27日，罗登贤客观分析南满形势后，给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请示满洲省委由沈阳迁至哈尔滨的问题》的请示信，详细说明日军占领满洲后兵工厂、炮厂、纱厂等工人离开乃至关门、报纸无法送达、工作因统治阶级戒严受阻的情况，主张把省委迁至哈尔滨。罗登贤还未得到党中央的回复，日本关东军就已经抢先在沈阳下手，出动大量宪兵搜查中共党员。11月底，中共满洲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被捕，省委机关遭到彻底破坏。12月，中共中央任命罗登贤为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负责重新组织省委机关。随后，罗登贤正式将省委机关迁至哈尔滨。从此，哈尔滨成为东北地

“每一个革命者的光荣的模范”

1932年12月，罗登贤被调往上海，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

1933年3月28日，他在参加全国海员工人会议时，由于叛徒出卖，被上海公共租界英国巡捕逮捕入狱。当反动机关以“反革命”为名对罗登贤进行“公开审判”时，他面对法官的质问，严正作答：“什么是反革命？我是反动分子吗？让我告诉你们的履历。我曾经帮助组织和领导省港大罢工，到满洲参加义勇军的战争，刚从满洲回来不久，又组织纱厂的大罢工。这一切的行动都是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一部分，难道我被控为反革命的活动是指这些事吗？”他的陈述让法官无言以对。

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罗登贤的消息被披露后，引起各界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4月1日，宋庆龄以个人名义发表《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摧残反帝的群众领袖罗登贤告全国民众书》，



罗登贤

东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忠勇实践者

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中心。为挽救满洲省委的损失，推动新的省委工作顺利开展，罗登贤把组建革命队伍放在工作的重要位置。1932年3月31日，他领导的中共满洲省委发表《告满洲各地义勇军书》，号召各地义勇军战士与“工人、农民、灾民、失业者密切的联合起来”，“武装工人和农民，勇敢坚决地和他们共同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军队出满洲”。此外，罗登贤还根据东北实际情况，制定了加强各地党组织对抗日义勇军的帮助、派遣干部到义勇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积极发展党员团员、组建党组织和党支部等政策。

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使罗登贤认识到建立我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必要性。1932年春，他和周保中等人起草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提出必须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才能取得抗日救国的彻底胜利。为贯彻文件精神，罗登贤领导的满洲省委派出许多优秀党员干部分赴东北各地建立抗日游击队。在他的组织下，东北各地陆续建立起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为以后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如杨君武和杨林在南满地区创建的磐石工农义勇军，后被杨靖宇发展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中共满洲省委的正确路线和策略，使东北地区的抗日武装快速发展起来，掀起了抗日斗争的热潮，延缓了日军迅速侵占全东北的计划。

并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发表《告中国民众书》，号召团结一致保护被捕的革命者。5日，宋庆龄等人到监狱探望罗登贤时，他对大家说：“我自始至终站在无产阶级方面，我为这斗争贡献了我的生命，什么也阻挡不了我。”宋庆龄对罗登贤的坚强意志所感动，她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并多方奔走营救，但终未能如愿。8月29日，敌人用尽一切手段无效后，决定秘密杀害罗登贤。在赴南京雨花台刑场前，罗登贤大义凛然地说：“我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罗登贤牺牲时，年仅28岁。

1934年6月26日，《红色中华》发表《纪念罗登贤同志》专文，指出：罗登贤“献身革命的精神，是我们每一个革命者的光荣的模范”。为了纪念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把江西省信丰县改名为登贤县。(据《中国档案报》)

陈明：红土地走出的抗战英雄

在闽西龙岩，一个英烈的名字至今仍然被当地群众传颂，他就是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陈明烈士。

陈明，原名若星，字少微。1902年出生于福建省龙岩县(今龙岩市新罗区)。1921年毕业于福建省立第九中学。曾与邓子恢等进步青年发起组织革命书社“奇山书社”。1925年到厦门中山中学任教。

1926年秋，陈明进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半工半读。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同年冬，任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宣传部部长，主编《福建评论》《国民日报》。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明到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同年8月，以中共中央福建省党部特派员的身份，回闽重建中共闽南、闽北两个特委，任闽南特委书记。12月，在漳州主持召开党组织联席会议，成立中共福建省临时委员会，任书记，后任省委宣传部部长。1928年9月，被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第3期学习。1931年冬回国后，进入中央苏区，被分配到瑞金红军学校担任教官。1932年4月被调到东路军先锋队部队，负责宣传工作。

1934年10月，陈明随中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后，调干部团任教，后任训练科长、政治委员。1936年任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高干科教员。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陈明任八路军随营学校政治委员。1939年冬，奉命进入山东，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后任中共山东分局党校副校长、山东分局政府工作部部长、山东省宪政促进会常委、山东分局政府工作委员会委员。

1941年4月，陈明任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主持整个战时工作委员会工作。他根据山东的革命斗争实际，撰写、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如《抗日民主政权》《拥护民主政权》等，还颁发了《县区乡各级政府组织条例》《民众抗日自卫团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为建设山东抗日民主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11月，日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沂蒙山区实行“铁壁合围”，妄图消灭中共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沂蒙山主力部队。11月30日凌晨，陈明在沂南与费县交界处的大青山和日军遭遇，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39岁。

红色是闽西的“底色”，也是这块红土地的“魂”。陈明烈士故乡龙岩是著名革命老区。近年来，龙岩市通过各种举措积极保护传承红色文化，进行了系统化、制度化保护，传承好红色基因，加快老区振兴。(据新华社)

一封读者来信的影响

晏阳初是著名的平民教育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前往法国，在战场上为华工服务，帮助他们代写家信，教他们识字……还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为华工创办了一份石印的《华工周报》，以帮助华工了解天下大事、增长知识，这份报纸出版之后，受到了广大华工的喜爱。

《华工周报》发行后，编辑部经常收到一些读者来信。在报纸出版两个月之后的一天，晏阳初看到了这样一封读者来信，大意是：“晏先生大人：自从您办周报以来，天下事我们都知道了。但是，您的报纸卖得太便宜了，只十个生丁，恐怕不久要关门。我现在捐出我三年的积蓄，三百六十五个法郎。”读完这封信，晏阳初感慨万千，因为华工们工作很辛苦，且收入微薄，而写信的这个华工，竟然捐出了自己三年的积蓄给报纸，这是多么难得的境界啊！感动之余，晏阳初更加坚定了为华工服务的信心，决心努力把报办好，为华工做更多的服务。

这封读者来信几乎影响了晏阳初的一生，因为正是这封信启发了他，也教育了他，此后的数十年岁月中，晏阳初一直努力推进平民教育及乡村建设事业，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为中国和世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平民教育专家和乡村建设人才，被称作“世界平民教育之父”……多年以后，他曾感慨地谈到这件事：“我在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他们的智力和热诚，渐渐引导我发现一种新人。这新人的发现，比考古学家发现北京猿人，也许还要重要。”(据《联谊报》)

冯牧的眼光

冯牧发现和扶植文学新秀的事，在文学界被传为美谈。

冯牧早在延安《解放日报》担任副刊编辑期间，就发表了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还撰文推荐了赵树理的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1944年，他读了马烽的小说《张福元的故事》后，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大大提升了这位“山药蛋派”主要成员的自信心。

20世纪50年代初，冯牧到昆明军区工作，发现、扶植、培育了徐怀中、公刘、白桦、彭荆风、周良沛等一大批作家。他指导他们如何观察生活、如何借鉴名著、如何深入基层。他带领这帮年轻人深入边疆地区，体察民情、收集素材，这才出现了《阿诗玛》《山间铃响马帮来》《五朵金花》等具有边地风情的名作。

到北京工作后，冯牧提出“文艺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浇花除草”。要多关注那些在“祖国的土地上茁壮成长的幼苗和花苞”，要为他们的成长“鸣锣开道”。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刊出后，引发争议。冯牧特意撰文，称“这是一篇反映工业战线生活的好作品”，并由此认定蒋子龙是一位“严肃的、有才能的作者”。1982年，《十月》杂志编发了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冯牧一读，被小说中的真切生动所吸引，当即写下《最瑰丽的和最宝贵的》一文，表达了对当时并不知名的部队青年作者李存葆的喜欢。

冯牧对于从最基层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也关爱有加。1983年，冯牧在《文艺报》上发表了对史铁生的评论。那时的史铁生还是一位不为许多人熟知的作者，但冯牧却从他“并非完美的作品中，看到了一种并不多见的‘才华’的闪光”。认为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必将成为他在文学征途上继续奋力攀登的一个可喜的标志和一个新的起点”。

2000年2月，冯牧文学奖设立，专门用于表彰青年批评家、文学新人和军旅作家。此奖的初衷，无疑与冯牧发现和奖掖青年作家的伯乐精神一脉相承。(据《人民政协报》)

遗留在大山深处的红军子弹



大陈战场上遗留下的残缺子弹、弹壳。

这是一批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江山时遗留在大陈战场上的子弹。江山市委党史研究室根据档案资料记载以及实地走访调查发现，从大陈战斗遗留的大坞岗、十八亩山、马鞍山等战壕遗址附近挖掘的这批子弹(包括子弹头、弹壳、弹头被甲等)，子弹有汉阳造、德国造，主要用于毛瑟驳壳手枪、七九步枪等。

1934年7月，为调动和牵制敌人，缓解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压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七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简称“抗日先遣队”)，保持军团建制，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等人率领下，转战闽浙皖赣，宣传推动抗日运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

1934年9月12日至16日，抗日

先遣队转战江山，经历了清湖、路口、贺村、大陈4场战斗。9月15日，从坛石石头、上王、占村出发，经竹林、里坂，于上午10时到达大陈休息宿营，军团部设在大陈。早在之前抗日先遣队就接到中革军委的多次命令，要执行破坏杭江铁路的任务。

抗日先遣队到大陈后，派出第一师一部去炸毁航头铁路桥，并在镇武山、马鞍山、十八亩山等地与国民党补充第一旅第二团和浙江省保安团第四团、第六团等部激战。先遣队主力分两路出击，一路由师长王震三率领第二师经南蕉攻击镇武山之敌，攻打浙江保安第一纵队第四团把守的阵地；一路由师长王永瑞率领第三师经夏坞攻打补充第一旅二团把守的阵地，同时接应炸桥的第一师部队。

下午5时，炸桥部队返回后，绕到敌人侧后，在莲塘畈、弄塘山一带打击预备队第六团，与主力部队形成夹击。此战，共歼敌70余名，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10多支；红军伤亡80余人，第三师师长王蕴瑞负重伤。9月16日，大陈战斗结束，抗日先遣队向常山方向挺进，国民党又派中央航空学校6架飞机参与侦察轰炸。

根据大陈当地村民讲述，在战斗结束后，他们曾掩埋、安葬过大批牺牲的红军战士遗体，村民在山上见到许多战壕，在那里捡到许多子弹、子弹壳。

遗留下来的这些残缺子弹、弹壳见证了抗日先遣队在江山浴血奋战的历史，战士们坚定信仰、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激励江山人民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据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